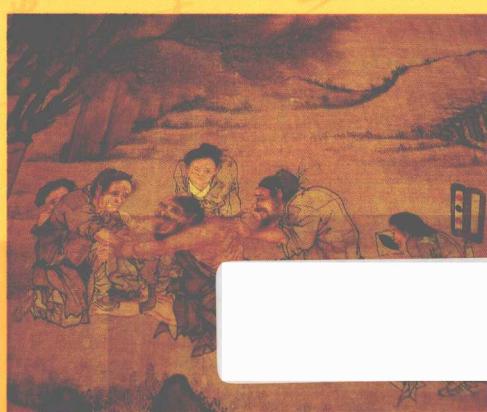


读通中医

费振钟 ◎著

在这沉疴遍地的时代，
以技术为上的当代医学乱象环生，
对照之下，中医何为？



肺系
中
医

九節

兩耳

六禁

读通

中医

费振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通中医 / 费振钟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512-2

I. ①读… II. ①费…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922 号

书 名 读通中医

著 者 费振钟

责任 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512-2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这里结集的二十四篇文章，原为作者在上海《东方早报·身体周刊》开设的“重读医案”专栏，稍后又在《美文》杂志上连载。自二〇〇九年写完《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我已不打算再写医学类文字，无奈《东方早报》在做了我一个关于中医的访谈后，意犹未尽，仍然坚持要我就中医文化继续谈谈看法。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下来了。理由却是，中国只有一份报纸以专刊叙述和讨论“身体”，我很喜欢，也很看重，还有比在这里谈论中国医学更合适的地方吗？

接下来就是怎么谈了，我选择了中医医案作为题材。在访谈中我说：《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重点在中国医学的知识史梳理，中医医案没有能够得到更多讨论，而医案对于中国医学叙事，其重要性显然不容忽视。较之西方医学，中医医案是一种特别有意味的医学叙事。其医学记录之早，自不待言，至于细致逼真的叙述和丰富精彩的细节，则提供了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医学的多种可能性。尤以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三百年间，大量个人医案，借助于城市书坊推介，得到公开出版，更是多层次、多色调、多角度展开了中国医学的叙事情景。我取医案重读，即多以明清两代医师的医学记录为主要材料，择取其中我认为有重新认识和理解必要的问题，加以申说，或者能见前人之所未明之处，在今天的医学氛围下，引

起反思与重新评估。

我一直将中国医学放在身体知识的前提下加以考察,因此,在我看来医案的记录与叙事,不是疾病的叙事,而是身体的叙事。中国医师对于身体的解释,成为他们诊治疾病时所有的依据,所谓“治愈之术”,实际上乃为“身体之术”,一种关于身体正常化和健康化的方式方法。也因此,中国医师的医学实践,并非技术化的实践,而是合身体目标的“医道”实践,从而最终将医学导入一种自然之思、哲学之思和人文之思。读他们的医案,我注意到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疾病的身。那些深陷于疾病之中的身体,如何看视,如何辨明,如何讲述,医案通过医师与病者的身体对话,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关系。在医师那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通联,则成为进入身体认识两大主要渠道,而疾病则在身体伦理的意义上,作为人类的生存性障碍和损害受到医学的检控,并被有效疏通和克制。

取此义项,我的重读医案,实际上并非复习有关身体知识,而是想在中国医学所依赖的身体知识中,理解医学如何在人类社会学立场上,保有这种身体知识的解释权。所谓医道,即为人道,中国医师恪守此人道传统,而施之于医术,孰谓无能?行之有效的“治愈之术”,正是靠此人道传统的支持,才会具有持续的内视力和内发力。

诗人尝云：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这是对人类生存所遭遇的身体痛苦的感伤。我相信一千多年前一位西方医师的话：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是为了解脱人类苦难。在这沉疴遍地的时代，以技术为上的当代医学乱象环生，对照之下，中医何为？亦须重新回到人类生存性需求和价值的维护上，加以最后的考量衡定。

十多年前，我曾有随笔集《悬壶外谈》，本书延续其旨要，其意仍在于中国医学的社会人类学指向和内涵，读者明鉴。

是为序。

唐振明

二〇一五年二月

目 录

自序	○○一
「意」，中医的哲思与美学	○○一
推想与假设的博弈	○○七
「顺从」身体，「平淡」是真	○一三
用道德解套信任危机	○一九
一张药方能通治百家疾病吗	○二五
看病先看「人」	○三一
「既生瑜，又生亮」：医学的对立	○三五
当「古法」遭遇「今病」	○四一
体系的壁垒与威权	○四七
为『忿怒的女人』把脉	○五三
杀人的人参	○五九

活着不是为了进医院 ······ ○六五

「灵根再生」，医学的灵光乍现 ······ ○七一

在死亡的迷宫里 ······ ○七七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 ○八一

中国医师的乡土情怀 ······ ○八九

谁来做中医的「裁判员」 ······ ○九五

他把医案写成诗 ······ ○一〇一

「访医」，悠游于江湖 ······ ○一〇七

将欲望关进医学之笼 ······ ○一三

「心病」怎么医 ······ ○一九

小儿要「冷冻」 ······ ○二五

「种子药」与不育症 ······ ○三一

「仁心仁术」，中国医学的终极关怀 ······ ○三九

附录一 理解中医——中医访谈录 ······ ○四七

附录二 与石剑峰谈中医经典 ······ ○〇七

『意』，中医的哲思与美学

章太炎先生晚年居住苏州，不再革命了，就连思想学术工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岁月里，他在锦帆路寓所，挂牌行医。以太炎先生中国文化的深湛造诣，对于医学一道当是了然于心，在吴门医学人才济济的姑苏城里，太炎老人俨然名医大家。有人认为，这位前革命党人和国学大师，其实也不过仿效了历来中国政治人物以医为隐的故事，如果老人家缺钱花了，就有从前的弟子、门人以及附庸风雅的政客、大亨以请医的名义，送来银子。这样的事情也许有过，但章太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有他的中国学问做抵押，又有他父祖辈医学传家，即使用医技来敷衍晚年的绝望无聊，也不会浪得虚名。

但这篇文字，不是讲章太炎的医学故事，而是拿来做医案重读的引子。这位一生热心医学的老人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现在新版的医案丛书，往往引用章太炎这句话，说明阅读医案对于增进医学技术，提高中医临床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事实上，自明清两代中国医人的医案，通过公开出版方式流行社会以后，它就成为医学教育最直接和有益的教材。中国江南地区一些著名医人医案，不单单为职业中医的学习范文，同时作为城市社会畅销读物，为更广泛的士大夫阶层读者所喜

读。较早时期喻嘉言的《寓意草》，就属于这类名医名案。

《寓意草》初为一卷本小册子，撰写在作者寓居江南常熟期间，于明代崇祯十六年（1643）由同文堂刊行，入清以后，作者又修订扩充为四卷。时人评价这本书“清华而不高深，灵变而有规矩”，成为清初江南三大名医医著中颇受欢迎的医学文本。实际上，作者本人当时即以《寓意草》中的医学案例，作为他给门下弟子授课和讨论医学的材料，所以又与别的医案不同，可说是一部研究型的医学叙事作品。

然而今天我们重读医案的目的，不仅仅在医学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层面上，了解“前人之经验心得”。或者说，重读医案尤须超越专业，超越应用，寻找中国医学的价值。章太炎由医案而肯定中国医学的“成绩”，按照我的理解，中医的“成绩”，不单指“临床”治疗效果，如果用整体的眼光看待中医历史，那么医案则集中表现出中国医学在处理身体与疾病时所能达到理论成就。作为一种特殊而又具象的医学叙事，医案展示了中国医学在前现代时期的全部可能性。正是透过这些可能性，我们将有机会进一步追寻中国医学所为何为，理解中国医学在知识表述上的特殊性，即作为证候医学的中国医学，是怎样通过感知和语言建立了一种意识结构，从而完成对身体（中

国概念只讲“身体”，不讲生命和肉体)与疾病之间关系的设定与译读，理解中国医学如何历史性地保持和充分发挥一种中国式的感性特点和先验精神，由此建构了它的唯心主义和唯理主义医学视域。同样，这里首先选择《寓意草》，我不是把这部医案看作医学应用的典范，也不把它看作严格的医学教科书，在我选读的多种医案中，《寓意草》显然比较合适做有关中国医学性质的宽度解读。

《寓意草》的成文时间，在十七世纪前期。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中国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再生产阶段，其表现在“温病学”的崛起。温病学是在主控了中国医学千年之久的“伤寒论”基础上，依据《内经》体系分解出来的另一种身体与疾病的认知范式。《寓意草》作者喻嘉言，为“伤寒论”大家，但他在《伤寒论》文本考释和辨析中，对自五世纪以来医学传统中流传的“伤寒论”知识结构和解释路径产生了怀疑，为此，他对《伤寒论》文本重加编排，从而成为《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中坚定的一员。这并非版本校勘，实质涉及到对中国医学的知识态度和立场。喻嘉言以“太阳三纲”为结构的“新伤寒说”，与旧“伤寒论”是两种不同的知识感知与解释。十七世纪末，一个新的身体与疾病感知知识系统——温病学，由此开始建立，可以说，中国医学开始进入喻

嘉言的时代。

与十七、十八世纪的众多医案比较,《寓意草》较早地代表了中国医学知识结构的变化,用福柯的说法,不是疾病发生变化,而是身体辨认以及描述这种辨认的语义发生变化。显然喻嘉言认真记录了这种变化在他个人医学实践中的反映,他在阐述自己的医学法则时,似乎随时都为获得这一种新的知识结构进行辩护。因此《寓意草》真正强调的不仅仅是那些被感知的个案,也不仅仅是那些对疾病的成功处理,而是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医学知识空间。他对疾病的事写,在理论上被还原为一种来自古老的《内经》对身体寓意的言说。

《寓意草》的出版资助人及评点者胡直臣,指出喻嘉言的知识特点:“知之深,故言之详。然皆根据《内经》,而非创说,又自有神悟,而非袭说。”“神悟”作为中国医学话语的哲学形式,在这里不仅指明喻嘉言将他这份由九十多条个案集合起来的医学记录,取名《寓意草》的内在理路,同时也暗示喻嘉言时代的中国医学,仍然信守《内经》以来“微妙在意”的思想传统。对此,喻嘉言将宋代“医者意也”,实践性地表达为:“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

十八世纪西方医学正当转型期,由观测和目视、病理解剖以及分类实验,而诞生发展出将疾

病剥离身体的现代实证性临床医学。同一时期的中国医学则依据其坚定的身体立场，继续行使着中国固有医学意识形态特权。这没有多少奇怪之处，也不必为中国医学失去向科学化演变的机会感到遗憾。与西方医学受“不确定性”认知的困扰，并致力于从这种困扰中走出来，以寻求对疾病绝对的真实说明相比，中国医学对于身体解释的优势并未丧失，疾病仍然以身体证候的形式为医人深所体会。重要之处仅仅在于，医人所持之“意”究竟如何运思于身体，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发挥其认识身体和疾病的能力。医学知识的重构与整合，给医人的主观感悟和认知，打开了更为宽阔的通道，墨守成规不能自悟，被认为是医学能力平庸的表现；疾病身体的不确定性，为医学的多样可能性提供了驰骋个人才能的开放性空间。

《寓意草》概括地说明了一切：“意”，这个十二世纪开始流行的医学领域概念，至十七世纪的喻嘉言，完善了它在医学认识论上的功能。尽管“意”的医学，或许无法完成向现代临床实证医学的转变，然而对于身体的忠实思考，却也避免了医学成为纯粹的人体物质试验的危险。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医学背离身体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制造疾病，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中国传统医学以身体为先的局限。而仅仅从医学个

性来看，“意”的持久魅力还在于，当西方依靠组织和制度构建临床医学，发挥医疗效率时，中国医学则更适合个人竞技，个体的发现与创造，使中国医学看起来如同美学一样引人入胜。

意有所指，于意云何，仍须深味。



推想与假设的博弈

几乎每一个中国医人，都会面对医学不确定性认知的危险。成功的医人化解危险的经历，在中国医学史上通常会演变为神异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的明清两代特别多见，那是因为医学印刷作品在城市社会盛行。尽管一般说来，这些故事会激起多数阅读者对于医学的崇敬，但医人本人却深知自己在面对每一种危险状况时，需要消耗的精力和智能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即使到喜悦的成功结束，仍是无法预期之谜，而不成功的痛苦，则让医人在事后很长时间都会郁积沉埋在内心，直到他们在医案中书写出来，一吐为快。今人可能很难理解中国医人的医学处境，为什么他们甘心在这种不确定性中饱受煎熬和考验，却不求改变？是他们能力不够吗？还是知道中国医学的不确定性无可避免，因而使他们在不可知的医学场域就像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上航行，未知前面方向，却更能获得冒险的乐趣。

至少有十多年医学经验的喻嘉言，已是一个成熟的“伤寒”专家，他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医学实践中，依靠对“伤寒”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即便这样，所有那些经他诊治过的“伤寒”病例，还是让这位国子监生员出身、年过半百的儒医，大费周折，煞费苦心。特别是与另外一些来自“伤寒”世家的医师们，围绕证候

所发生的争论和冲突,让他既烦恼又骄傲,既自负又失落。他觉得,仅仅用治疗的有效性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说明所有那些疾病的事,才有可能厘清伤寒病的知识立场,以及他在处理“伤寒”的身体时所采用的认知模式。因此,“伤寒”解读在他的《寓意草》中,成为喻嘉言首要的叙述主题。

不妨从《寓意草》第一卷连续性的伤寒病案中选择六例来说明。第一例黄长人,中年,平时不服药,病后十天“忽然昏沉,浑身战栗,手足如冰”;次例金鉴,年岁不详,“春月病温,误治二旬,酿成极重死证。壮热不退,谵语无伦,皮肤枯涩,胸膛板结,舌卷唇焦,身倦足冷”;再例徐国祯,“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常大躁,将门牖洞启,身卧地上,更求入井”;四例钱仲昭,“患时气外感三五日,发热头疼,服表汗药,终止热不消,口干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红斑,神昏谵语,饮食不入,大便复秘,小便热赤,脉见紧小而急”;五例张某,“伤寒坏证,两腰偻废,卧床彻夜痛叫,百治不效”;六例黄曙修、黄起潜父子,“春月同时病温,乃翁年老而势轻,曙修年富而势重”。

六个病例的时间跨度多大,医案没有记录,但可以看作特定的时间过程中构成的“伤寒”系列,作者其实也有意通过他的叙述,建构一种医学时间,以便从不同的病人和不同的证候来展开

疾病的知识结构。

判断这些疾病患者时,喻嘉言碰上的问题是疾病的本质与证候丰富性之间的区分,他与“世医”的分歧与争论,以及自我认知的差别与难度,都体现在显现的疾病事实与隐蔽的疾病本质之间的矛盾对立当中。黄长人的例子,世医认定为“阴证”,喻嘉言则判别为“阳证”,前者按“伤寒”阴厥成法理解,而“不知传经之热邪转入转深”,因此后者以“热深发厥”来断定疾病的根源。金鉴的伤寒,已经过其他医师当作单纯“阴证”治疗,喻嘉言辨析为“春温证不传经”,“阴证、阳证,两下混为一区”,按传统的“伤寒”认知,这是一种“死证”。他个人缺乏处理这种阴阳混合疾病的经验,只能按“活法在人,神而明之”的古训,天机自动,灵活运用。徐国桢与前两例不同,一位世医断定热证,气势汹汹要用“承气汤”方治疗,喻嘉言坚决反对,“阳欲暴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以姜、附投之,尚恐不胜回阳之任,况敢以纯阴之药,重劫其乎?”这种对于疾病身体寒热关系的把握,并非知识观点改变,而是他对“阳证”的身体有着变化性的认识。钱仲昭又是一种,此人三五天时间,病情危急,同样因为被其他医师误治。在喻嘉言看来,钱仲昭的身体“阳明胃经表里不清,邪热在内,如火燎原,津液尽干”,这种“虚热内炽”表现出来的疾病证候,需要通过“甘寒”加